


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

*Zhongguo Shidai Jingji Mingjia Jingdian Wencong*

# 于光远

经济文选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

Zhongguoshidaijingjijiajingdianwencong

# 于光远

## 经济文选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于光远经济文选 / 于光远著.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119-0183-5

I. ①于… II. ①于…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4026 号

书 名: 于光远经济文选

---

出 版 人: 宋灵恩

作 者: 于光远

---

出版发行: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邮政编码: 100044

发行热线: (010)68320825 68320484

传 真: (010)68320634

邮购热线: (010)88361317

网 址: [www.cmepub.com.cn](http://www.cmepub.com.cn)

电子邮箱: [zgsdjj@hotmail.com](mailto:zgsdjj@hotmail.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72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9-0183-5

定 价: 49.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ZUO ZHE JIAN LI

## 作者简历



于光远，中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曾用名郁中正。1915年7月5日出生于上海。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同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后成为该组织领导人之一。1936年夏在上海参加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团体——自然科学研究会，开始从事理论研究工作。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37年初到1939年5月，他先后在北平、太原、广州、武汉、粤北等地从事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1939年7月到1945年11月在延安从事党的青年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和对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工作。在延安期间，他曾兼任中山图书馆主任，在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和延安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在中共中央西北调查研究局任研究员期间，他与柴树藩、彭平合写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



步研究》(此书后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延安期间,他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翻译了德文版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946年被中共中央派驻北平创办《解放》(三日刊),并任编委。国共谈判破裂后,他又回到延安,担任《解放日报》言论部副主编。1947年3月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1948年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直到1975年。曾任中宣部理论教育处副处长、处长和科学教育处处长等职。与此同时,他还兼任《学习》杂志社主编,撰写了若干社会科学理论读物。他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国内曾产生了广泛影响。1955年他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现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从1956年起,他还曾兼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并曾兼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1958年起曾为中央科学小组成员。1964年起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文革”中他受到迫害,被下放到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劳动。到1975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时,他才正式恢复工作,任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1977年他被重新任命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同时,他受国务院委托筹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并兼第一任所长。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他任副院长,并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此外,他还担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1982年退居二线后至1987年,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至今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ZHU YAO ZHU ZUO<sup>1</sup>

## 主要著作

- (1)《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与柴树藩、彭平合著),20世纪40年代出版,延安。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出版,北京
- (2)《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人民出版社,1954年5月出版,北京
- (3)《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学习》杂志社,1958年4月出版,北京

版，北京

(6) 《试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 C. V. M》，人民出版社，1979 年 8 月出版，北京

(7) 《关于规律客观性质的几个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 年 11 月出版，北京

(8)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 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 12 月、1981 年 7 月、1985 年 10 月、1988 年 9 月、1991 年 9 月、1996 年 5 月出版，北京。第 7 卷是 2001 年 11 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9)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十三篇文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2 月出版，北京

(10)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 1 月出版，北京。1984 年 7 月出版增订本

(11) 《战略学与地区战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年 11 月出版，沈阳

(12) 《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 月出版，长沙

(13)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 8 月出版，北京

(1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年 8 月出版，北京

(15)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 年 3 月出版，北京

(16) 《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 年 12 月出版，北京

## 于光远经济学主要学术思想

于光远是一个兼具深切的社会关怀和学术关怀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学术活动中，总是试图寻找二者间的支点，来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广泛的学术兴趣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学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因此，要了解他的经济学思想和所提出的理论，有必要同时了解产生这些思想和理论的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乃至他个人的经历。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其主要学术思想的介绍将基本限于学理本身的范畴。

### 一、“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于光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上面。当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通常承袭着苏联学者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说法，叫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于光远则提出了另外一个用语，即“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一用语后来被不少经济学家所接受。对于为什么不沿用原来的说法，于光远提出的一个理由是，有一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由于其着眼点和结论是社会主义的，因此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这种研究和以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对象的研究是不同的，将两者按照同样的名称称呼容易发生混淆。

然而这个根据只是他采用新用语的一个考虑。他采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个用语时，事实上也是标志着他当时所主张的一种研究取向，即试图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在统一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在他看来，以苏联经济学者写的教科书和相关论著为代表的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远未达到像马克思那样对一种经济形态加以科学“解剖”的程度。

不过，他并不主张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局限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架构和范畴内。他认为，学科的发展和时代的特点、时代的任务、时代的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在1983年的一篇论文中，以“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命题展开了论述。在这里，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成上下两篇，即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资本

论》属于上篇的范围，其任务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说明社会主义产生的根据。而当前的时代要求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以解决大量的建设问题，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其中重要的基础理论。它要分析一系列与经济建设有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如制度与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制度与合作和竞争、制度与计划性等。他认为许多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事实上没有揭示出多少对于建设有意义的道理。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曾委托于光远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一背景曾促使他尝试完成比较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当时他组织了一批经济学家工作了5年，完成了几十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初稿。但在准备修改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工作因此中断。“文革”后，一度准备再起炉灶。然而，越是深入的研究，越使他放弃了体系化的打算，而宁可围绕问题展开探索。他将自己的工作定位在“探索”上，他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论文结集出版，定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7卷。

## 二、所有制实现论和所有制选择的生产力标准

所有制理论是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来自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传统架构是，将经济关系分为三个方面，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过程中人和人的关系、消费资料的分配。这三个方面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其他两个方面，因而是最重要的。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在这个分析框架中，被处理为外生的，并不受经济活动过程的直接影响。于光远不满足于这样的处理。在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有关所有制的论述后，他根据马克思关于“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思想，发展出“所有制实现论”。根据这一理论，所有制要在生产组织、交换、分配等经济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实现，才是有经济意义的，否则便只是法律的想象。这样，所有制不是被理解为由国家强制力一次性安排下来的，而是伴随着各种经济活动的一种过程，它在这一过程中被塑造、硬化或改变。70年代后期，他运用这样的观点，对于“四人帮”将按劳分配和公有制割裂开的做法进行了批判。“所有制实现论”为中国的一批经济学家所接受。

以“实现论”作为理论基础，他对一些不同形式的所有制进行了分析。一个有代表性的论点是他对国家所有制的区分，即把国家所有制区分为直接的国家所有制和间接的国家所有制。所谓直接的国家所有制是指由国家支配资源的使



用、确定和委派经营者的制度；间接的国家所有制则是和国家力量向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渗透联系在一起，只要国家享有某种收益权，便意味着这种所有制的存在。依此逻辑，在存在国家税收的地方，也意味着国家对计税资产拥有某种所有权。他的这种思想来源于恩格斯关于国家税收造成对私有权约束的论点。许多经济学家大概不会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但是，除了需要做出进一步澄清概念等技术性的工作之外，他的论点中涉及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即产权与国家权力间的关系，产权界定机制和国家权力结构的关系。

从1978年起，于光远把研究重点放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他是最早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提出，在决心改革之后，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应该确立怎样的所有制形式和结构。他批评了当时的不少干部头脑中存在的以“大”和“公”为标准判别所有制优劣的看法，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所有制优劣的序列表，即国有制无条件地比集体所有制优越；集体所有制无条件地比私有制优越；在集体所有制范围内，公社所有无条件地比大队所有优越，大队所有无条件地比小队所有优越；在小队所有的范围内，不联系产量的工分制无条件地比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优越等。他认为，这样一张所有制优越性的序列表不破除，改革是很难展开的。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写的文章中明确主张以生产力为标准来确定所有制的建构政策。

### 三、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企业组织

于光远认为，经济活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组织，改革之前的中国经济可以概括地说是一种“调拨产品经济加自然经济”，而改革则是从这种经济向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存在着两个重要的机制，他称为“商品承认”和“商品化”。所谓“商品承认”指的是，对于过去没有进入交换过程的劳动产品，现在承认它们是商品，使它们进入流通；所谓“商品化”指的是，一些本身并未消耗劳动的东西，使它们进入交换，具有价格。哪些物品被“商品承认”和“商品化”，在怎样的规模上被“商品承认”和“商品化”，人们是可以做出安排的。然而，不同的安排状态和经济效益之间却存在着有规律性的联系：在某种安排下，经济可以得到较好的发展，人们可以取得更大的效益；而在另外的安排下，经济则不能得到较好的发展，人们只能得到较小的效益。这里存在着比较。取得较大效益的动机，会促使人们做出新的安排。从调拨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对“商品承认”和“商品化”边界的重新安排。

那么，更具体而言，究竟是怎样的因素促使政府做出这种重新安排？于光远的论述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的发挥，他认为这个因素和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因类似；二是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复杂性，当经济活动的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复杂到一定程度，再将它们纳入调拨产品经济框架，便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不经济。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于光远认为，只有具有独立的商品—货币资金运动，进行独立经济核算的经济组织才是企业。根据这样的理解，他把现实中被人们称为“企业”的经济组织分为三类，即完全企业、不完全企业、虚假企业。完全企业是指有完全独立的资金运动，即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虚假企业在表面上有资金运动，也计算“成本”“利润”，但本身没有经营权，也不在经济利益上承担经营后果，这种经济组织只有企业的外表；不完全企业则处在完全企业和虚假企业之间，这类企业有或多或少的部分经营权，并部分承担着经营的后果。这个分类为比较企业组织研究、为从调拨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

近20年来，于光远围绕有关企业和市场经济问题发表了许多见解。他在1992年因患癌症住院治疗期间，还写了一系列有关市场经济的文章，汇成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为题的文集出版。

#### 四、按劳分配研究

于光远从着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开始，便十分重视生产者激励问题。承袭着当时的研究框架，他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首先集中在按劳分配范畴上。把他20世纪50年代的有关论文和苏联经济学家编写的教科书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他的研究不论是在概念的界定（如对劳动概念的分析），还是在命题的逻辑表述上，都更加精密。

促使他进一步深入对接劳分配加以研究的社会事件，是“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接劳分配的批判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对各种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劳动报酬形式（如计件工资、奖金等）的取消。1977~1978年，于光远组织学术界针对“四人帮”宣传的“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批判‘唯生产力论’”等组织了一系列理论讨论。这些讨论打破了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推动了思想解放，同时也深化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对接劳分配这种分配方式，于光远详细讨论了对“劳”的几种不同理解。它们包括：（1）按自然劳动时间来确定劳动量的大小；（2）按劳动支出或劳动力的

消耗来确定劳动量大小，这里考虑到劳动的复杂程度和熟练程度；(3) 不仅考虑劳动的支出，而且将相同劳动条件下劳动有效性这一因素包括在内；(4) “劳”就是指劳动成果。他主张第三种理解，而第四种理解，因为加入了生产工具和自然条件的差别因素，所以已经超出了按劳分配的范围。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他认为至少存在着这样一些分配方式：按劳分配、按劳动能力分配、按岗位分配、按劳动成果分配、平均主义分配等。他对不同分配方式的存在条件，实施后果，以及可能的演变趋势进行了分析。

他从对按劳分配的研究引申到对平等（公平）问题的研究。他强调，平等的观念是相对的，它意味着使用同一尺度。这就是说，对某一尺度来说是平等的，对另一尺度来说就是不平等的。按劳分配以劳动作为尺度，这是一种平等，如果用需要做尺度来衡量，就是不平等；反过来，实行按需分配以需要做尺度来看是平等，但是用别的尺度，如劳动来衡量，就是不平等。他曾谈到，对近年一些有关公平和效率的谈论存有怀疑，他认为，问题不在于一般的谈论公平和效率是什么关系，而是在于不同的尺度和效率是什么关系。

## 五、经济效果学和以个人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效果观

经济效果学是于光远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着手和倡导研究的学科。当时，针对以政治为引导的大范围的浪费行为，他开始对经济效果问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中力求将数学方法引入。他将经济效果学定义为，对各项社会实践活动进行经济效果计算、分析、评价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如何应用它们的科学。

于光远的经济效果（经济效益）理论的一个特点，是强调个人使用价值（或个人需要的满足）是社会经济效果的基础。他的这一认识在 20 世纪 50 ~ 60 年代的研究中已经基本清晰化和系统化。这种社会经济效果观和当时盛行的将政府目标等同于全社会目标的理念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可以这样说，于光远后来的经济改革思想和他的这种理念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这种社会经济效果观（或社会经济效益观）和用政府目标，特别是政府的政治目标取代社会经济效益目标的政策间的矛盾，是引导出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由于光远首先提出讨论的我

倡导经济学家和数学家合作，并商量好两人合作带研究生。但是因为“文革”开始，未能实现这个计划。

于光远在50~60年代写的关于经济效果的论文，汇集于《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一书中，该书于1978年出版。1984年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

## 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被人们所熟知的命题。但是，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却很少见有研究。由于这方面研究的缺乏，因此难以说明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如人们何以会建构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也难以对生产力变化后将会对生产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做出较为具体的理论预测。

于光远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有很大伸缩性但又有规律性的对应关系。他将对应关系分成两类，即一一对应、一多或多一对应。他认为，不论是回顾历史还是观察现实，都可以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多对应”和“多一对应”的关系。之所以会出现复杂的对应关系，是因为生产关系的形成和维持，除了受生产力制约外，还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不过，强调对应关系的复杂性和弹性，并非认为生产力的任一状态可以和生产关系的任一状态相对应，也就是说，对应是有边界的。

复杂的对应关系会产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有必要研究生产关系作用于生产力的机制问题。对此，他提出了一个双渠道结构的理论框架。在他看来，生产关系促进或阻碍生产力是通过生产者个人的积极性和生产组织（分工、协作等）这样两个渠道实现的。他对这两个渠道中的基本作用机制做了进一步研究。比如，他指出在生产者积极性和生产力之间存在这样的链条：生产者积极性—原有生产力（生产力存量）的发挥—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组织和生产力之间也存在类似的链条，同时还涉及集合的生产力。双渠道划分隐含的一个命题是，特定的生产关系通过不同渠道影响生产力时，其作用方向（促进或抑制）及作用大小可能是有差别的。

在两个渠道中，于光远更重视研究的似乎是个人的生产积极性。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就十分重视激发生产者积极性的按劳分配问题的研究。在生产受到严重冲击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进一步思考了个人的生产积极性问题，这种研究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他或领导或倡导或支持并积极投入的有关按劳分配、所有制形式结构改革、商品经济等颇有影响的讨论奠定了基础。个人的

创造、经营、生产积极性是他评价经济制度优劣的最主要标准，他的以所有制形式结构改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主张，主要就是以此为为基础的。他对于发展市场经济的积极主张，也与他对于生产者、经营者积极性激发的重视有密切联系。

## 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对社会历史的演进进行理论思考，对社会发展的阶段进行研究，一直是于光远的学术兴趣所在。在思考我国改革前的重大政策失误时，于光远意识到，现实地认识我国社会所处阶段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他开始研究中国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问题。他认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生产力高度发展、消灭了商品生产的社会之间的差异。同时他也不赞成认为我国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的看法，这是因为这一“过渡时期”已经有了明确的界定，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他思考的结果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确认“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意味着承认原来所追求的那种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多种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是更高级的阶段。他认为，50年代的那种看法，并不是在对社会生产力和其他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今后将进入怎样的阶段，必须以现实为基础，进行科学分析后才能知道。

从1981年起，他利用参与讨论中央文件的机会，多次主张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其基本特征的论述写入中央文件。他的意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87年，于光远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专著《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在该书中，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以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失误；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特征；探讨了现存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抑制或促进，以及可能的演变趋势。我们看到他在学术上的这样一种努力：将由社会生产力所制约的大的历史演进阶段和在特殊的选择、特殊事件影响下形成的小的阶段有机地联系起来。

## 八、重视消费经济学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初，于光远就提倡开展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对当时有人提出我国“消费早熟”、要“抑需求”的说法，他就表示过不同的意见，认为我国不是“消费早熟”而是“不熟”，即消费不足，应千方百计扩大内需，鼓励消费。为此他撰写了许多有关消费经济理论的论文，并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1999

年，在他 84 岁高龄时，他学会了用电脑打字。由此引发了他对消费品理论新的思考，并在 2003 年出版了《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一书。该书出版后，召开了几次研讨会，许多经济学家对于老书中提出的独到见解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给予很高的关注和评价。

## 九、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开拓新研究领域

于光远认为，经济学可以研究的领域是十分广泛的，而我们又面临建设现代化社会的任务，非常需要有着多维度内容的经济科学体系的支持。从这样的考虑出发，他热心倡导和支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逐渐积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学科。

例如，他在 80 年代初提出，以国土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在进行，因而可以建立一门国土经济学。这门学科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保护、开发和利用国土资源加以研究。他不仅撰写了一些论文，而且亲自带领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考察了甘肃、青海、贵州、江西等省和珠江、乌江流域等地区。他有关国土经济学研究的一些意见不仅为经济学界所重视，而且也被政府所采纳。

又如，80 年代初他提出应该开展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在这个研究领域，他强调产值目标的局限性，强调对生活质量、环境质量的重视。他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一般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问题。他提出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两个维度，即全国战略中的地区战略和地区战略中的地区战略，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他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方面的著作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战略学与地区战略》等。

于光远在经济学方面倡导发展的学科还有：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灾害经济学、环境（或生态）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为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他写了不少文章，也做了许多组织工作。

刘世定 胡冀燕

2010 年 4 月



ZHONGGUOSHIDAIJINGJINGJIAJINGDIANWENCONG

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 于光远经济文选

---

## 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是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个中心问题

任何社会的生产，都是能够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能够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物质资料，只是资本家为了取得剩余价值的手段。资本家是只在为了替自己生产剩余价值的限度内才关心社会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本身，就是生产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一个中心问题，那么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就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一点，在斯大林同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里早已讲得很清楚，只是在以往我们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当中似乎重视得不够，所以今天还有特别强调地指出这一点来的必要。能够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物质资料，在政治经济学里就说它具有某种使用价值<sup>①</sup>。

由于社会生产目的的不同，社会需要、使用价值，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出两点来说明。

### 1. 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里，我们是在讲到商品的两重性时去讲使用

<sup>①</sup> 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可以不是劳动生产物。空气、水、处女地、自然草地、野生林木、野生动物等就是这样。但是绝大多数的使用价值是经过劳动加工的东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差不多都属于这一类。当然能够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还有政治经济学上叫做“劳务”的东西。它和平常我们说的劳动生产产品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在劳动产品中“劳动是对象化了”，而劳务却是正在进行的劳动，即生产“运动形态上”的劳动。例如，演员在舞台上演戏，他们是在创造一种可以满足社会需要的东西，创造一种使用价值，但是并没有创造出什么劳动生产产品。演戏和缝制一件衣服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演戏这种生产过程和看戏这种消费过程是不能分开的，在这种场合，生产过程终止了，消费过程也就终止了。而缝制衣服这种生产过程，和穿衣服这种消费过程却是完全可以分开的。劳务在满足社会需要中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第一，它在满足人们的需要中占的比重终究要比劳动生产物占的比重要小得多；第二，在生产劳务的时候，不能没有劳动生产产品做它的物质基础（如演员要能演戏，就一定要生活资料来维持生活，并且一般还要有服装、灯光、舞台等物质资料）。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中，劳务的重要性是完全不能和劳动生产产品并列的。在政治经济学里讲的使用价值，如果不特别加以说明，平常指的也就是劳动生产产品。

价值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虽然明确地指出可以有并非商品的使用价值，但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并非商品的使用价值，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是不占重要的地位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情形就不一样了。如果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时候，把使用价值这个范畴也局限在“商品两重性”的限度内，那就不对了。谁都知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着的巨大财富，并不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着的巨大财富那样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sup>①</sup>。

社会主义的生产主要也不是商品生产。如果只在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时才叫人想起使用价值，那就会妨碍我们对社会主义生产的深刻理解。

2. 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里，虽然一开头讲商品两重性的时候，就提出使用价值这个范畴。但是商品生产的目的既然是为了交换，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既然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注意的中心自然就放到价值这一方面，而不放到使用价值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里，对使用价值只做了很简单的分析，接着就马上转用更多的篇幅去分析交换价值和商品内在的固有的价值。在《资本论》以后各章的分析当中，虽然到处注意到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担当者，注意到生产的物质方面，注意到劳动生产物的实物形态，注意到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因而很重视使用价值，到处提到使用价值，但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更加注意的终究是价值，是剩余价值，不是使用价值。这种情形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时候是应该有所改变的。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不但应该一开头就要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社会需要，因而着重于使用价值方面，并且应该在以后的分析当中，常常回到这个根本观点上来。当然，在政治经济学里不是要去研究使用价值的自然属性，研究它们的效用。研究这些东西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另外一门学问的事情。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这上面要做的事情，只是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性的时候，要把如何生产出更多、更好、更合乎需要的具有各种使用价值的产品，如何合理地把这些产品分配到需要它们的地方去，以及如何合理地去消费它们等，当做自己应该注意的一个中心问题就行了。

## 二

社会的需要是非常复杂的。个人消费的需要是人们直接的也是最根本的需

<sup>①</sup>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